

# 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的集体行动： 对过去三十年间三次集体行动浪潮的一个回顾

刘 能

---

**内容提要** 本文在总结集体行动参与者主导形象变迁的基础上,针对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事实,指出了经济利益重构和经济利益博弈是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地形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因素,并提出:在三个不同的时期,围绕特定稀缺资源的争夺,构成了解释过去三十年间三次集体行动浪潮参与者主导形象变迁的一个根本机制。在提出一个扩展了的时间框架之后,作者探讨了这三次集体行动浪潮更迭所揭示的三大趋势——世俗化、基层化和暴力化,并结合“历史—文化的”视角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构性现实,对中国集体行动场域的未来图景,在宏观层面上做了一个初步的推测。

**关键词** 集体行动 中国 转型社会 世俗化 基层化 暴力化

---

中国社会的伟大转型,开始于经济的领域:从农村产权制度和生产管理制度的改变开始,到全国性市场经济各要素的逐渐完备,再到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一体,我们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见证了经济领域的种种变迁和发展<sup>①</sup>。回顾这三十年的历史,我们观察到的大型集体行动浪潮,都或多或少与当时的经济改革和经济重构有着密切的关系:1980年代中后期的价格制度改革以及后续的严重通货膨胀,为当时全国性政治风波的爆发,准备了足够的后备参与动机;1990年代中后期的国营企业重构和与之伴随的大规模裁员下岗,以及分税制后乡村地区的财政紧张和由此引发的税费负担过重,为当时都市地区和乡村地区两大首属弱势群体的需求保卫运动,提供了主导参与人群;最近的10年,随着城市化和空间开发的进一步加速,围绕私有财产权和经济收益权而展开的地方性集体行动事件也呈现出频繁爆发的态势。可以说,经济转型的过程和结果,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中的集体行动浪潮提供了结构性的缘起。因此,与经济转型直接相关的

利益重构和利益博弈,成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地形的一个重要视角。<sup>②</sup>

## 过去三十年间的三次集体行动浪潮

在早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通过对三个不同时期的三组经验案例的展示,作者以集体行动参与者的主导形象变迁为题,对过去三十年间的三次集体行动浪潮进行了一次理论回顾(刘能,2008)<sup>③</sup>。在该文中,作者指出,在1980年代中后期,集体行动参与者的主导形象是以传统精英为代表的社会类别群体(social categories)或身份共同体(status groups);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集体行动参与者的主导形象,则转而代之为以下岗工人和抗税农民为代表的首属社会弱势群体(primary minority groups);进入21世纪,集体行动的爆发一直维持着较高的频率,其在地域上的扩散程度,也突破了传统的都市空间/乡村空间的界限,因为集体行动参与者的主导形象,已经转变为作者所称的地域共同体(spatial communities)了。紧接着,围绕着

怨恨本质、认同感强度、动员机制、社会控制的潜在含义等多个理论维度,文章对这三个时期集体行动参与者主导类型变迁所涉及的理论和经验含义,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参见刘能,2008:118,表四)。

如果以上这个总结看起来似乎有点道理的话,那么作者还需要进一步对以下两个问题作出澄清:(1)如果我们承认这样一种变迁存在的话,那么背地里支持这一变迁的机制是什么?换句话说,伴随着集体行动参与者主导形象的变迁,中国社会中的政治地形发生了什么样的根本变化,而我们又应该如何来理解这样一种变化呢?(2)其次,我们还需要做出解释的是,当代中国集体行动的未来走向将会如何?这一领域的可能图景(scenarios)都有哪一些?其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各自如何?

在下面的行文中,作者首先对第一个问题给出一个尝试性的解释;其次,通过一个延伸了的时间框架,作者将在回顾历史和梳理现实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社会中集体行动领域的未来图景,做一个宏观的推测。

#### 集体行动参与者主导形象变迁的一个解释 机制:稀缺资源和需求保卫

如上所说,作者首先需要过去三十年间支撑集体行动参与者主导形象变迁的机制和逻辑做出解释。从1980年代中后期的传统精英(社会类别/身份共同体);到1990年代中后期的首届弱势群体;再到最近10年里日益成为大众媒介主角的地域共同体<sup>④</sup>,究竟是哪个因素在支撑着这一转变呢?

作者给出的一个可能解释,就是在这三个时期中,中国社会中最为稀缺的资源类型发生了更迭:每一个时期的意愿表述和集体对抗,都和一种特殊的稀缺资源相匹配。在1980年代中后期,集体行动参与者的需求保卫,是围绕着路线合法性资源和更为公平的经济分配秩序而展开的——前者具体表现为路线立场的冲突,即中国究竟是选择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以便进一步抓住融入全球化的机会,还是保持封闭保守的现状;后者则表现为对明显冲击经济分配正义的官倒现象和早期腐败现象的强烈回应。

在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扩展,集体行动参与者的需求保卫,则转移到更为具体的层面:这一阶段集体行动参与者的主导人群,在都市地区是下岗工人,在乡村地区是抗税农民——与前者相关的稀缺资

源,是支撑产业转型的人力资本以及与此相关的福利资格;与后者相关的稀缺资源,则是农村宝贵的财政资源和现金收入。

在21世纪的最近10年里,集体行动参与者的主导类型,已经逐步转变为保卫居住环境、土地房屋产权和各类经济收益权的地方性居民。因此,这一阶段的需求保卫,针对的是空间权益和财产权之类的稀缺资源。

综上所述,如果说作者给出的这个机制——对稀缺资源的争夺——真的能够解释中国转型社会中集体行动参与者主导形象的变迁的话,那么,我们又可以得出一个派生性的结论,即:在制度化渠道之外,集体行动参与者只有选择实施破坏性战术,才能比较迅速地获得与体制内的行动者进行政治/福利资格和物质利益磋商的机会。

#### 时间框架的延伸:三大趋势和 关于未来路径选择的思考

发起和延续集体行动的能力,是人类社会性的重要表征;政治性的集体行动,是政治史和社会史永恒的核心论题(Tilly, Tilly and Tilly, 1975; Tilly, 1986)。在我们讨论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集体行动史的时候,我们的时间框架并不仅仅局限在这三十年里。我们的视野里,应该还有几千年定居农民的起义史和改朝换代史、主要由流民支撑的近代抗争史、过去几百年的民族主义动员史。同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过去100年我们的政治图景,其中很大的篇幅,是由一幕幕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所书写的(Esherick, 1987; Perry, 1993; Chow, 1960)。

从最近的历史来看,文化大革命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式政治集体行动的最好背景,尤其是它所赋形的暴力倾向(Perry, 1985; Andreas 2002; Walder, 2002)。而在我们的四周,在全球化了的大众媒介的素材库里,我们也看到了发达西方世界中常规政治挑战者的典型形象——在街道、广场和其他核心公共空间中,公民行动和非暴力抗议活动的密集展示。由伊拉克战争引发的全球反战运动,以及由世界经济秩序重构引起的反全球化运动,是最近最为瞩目的两类持久集体行动。

如果让我们把过去三十年的时间框架分别向前和向后进行延伸,那么我们有怎样的额外发现呢?图1给出了一个时间框架,似乎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过去三十年的政治动力学。

图1 时间框架的延伸: 三个趋势和关于未来路径选择的思考

1949年之前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宗教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土地革命	1949—1976年, 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政治动荡期	1980年代中后期, 传统精英(社会类别/身份共同体)主导的集体行动	1990年代中后期首属弱势群体主导的集体行动: 下岗工人/抗税农民的道义经济	2005年前后, 地域共同体发起的需求保卫: 空间权益/财产权/收益权	未来走向: 公民社会/监控国家/人道主义道德国家/技术治理社会?
特点: 政治性和生存性交错	特点: 政治性主导	特点: 政治性, 兼顾经济正义	特点: 生存性/经济正义主导	特点: 经济正义/生存性主导	预测: 政治性的恢复?

1. 世俗化: 经济利益日益成为集体行动的保卫目标

2. 基层化: 基层政府日益成为集体行动的抗议目标

3. 暴力化: 集体行动参与者使用暴力的可能性在增加

图1扩展了过去三十年的时间框架: 在1979年之前, 我们又分别看到了两个“历史—文化的”(historical-cultural)影响来源: 其一是1949年之前, 一个笼统地包含了“前现代时期和现代初期”的政治动荡时期, 主要的集体行动类型包括了农民运动、宗教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和土地革命。这一时期集体行动的主要特点, 是政治性目标和生存性目标的交错和混合, 在动员形态上, 则表现为浓厚的民生主义和民粹主义特点。其次是1949—1976年间以文化大革命为高潮的政治动荡时期, 对领袖、阶级和政治立场的忠诚, 成了最为重要的行动动员诱因, 因此, 这一时期集体行动的主要特点, 在于其浓厚的政治性。

那么这两个“历史—文化的”影响来源, 究竟对过去三十年间的集体行动场景施加了何等影响呢? 且让我们先对过去三十年间的集体行动史所表现出来的三大趋势做一个概括性的总结, 然后再看这三大趋势与上述两个“历史—文化的”影响来源之间的关系。

### 1. 三次集体行动浪潮所揭示的三大趋势

图1下端的三个箭头, 为我们指示了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社会中的集体行动浪潮所揭示出来的三个重要趋势。首先, 我们看到了一个“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趋势, 也即经济利益日益成为各个时期集体行动的主要保卫目标。1980年代中后期传统精英主导的集体行动, 虽然最主要的动因是对政治改革合法性的争取, 但他们感受到的地位挫折感和经济上的相对剥夺感, 同样也是引发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 这个阶段的集体行动的主要特点, 在于以政治性为主, 兼顾经济正义。1990年代中后期城乡首属弱势群体掀起的集体行动浪潮, 更类似于James Scott所说的道义经济(Scott, 1985), 因为他们保卫的是自己最为根本的生存权。因此, 这一阶段集体行动的主要

特点, 便是以生存性和经济正义为主导。时间迈入到21世纪之后, 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地域共同体为维护自己的空间权益(环境质量)、财产权(土地和房屋)和收益权(如租权、经营权)而爆发的集体行动浪潮, 因此, 这一阶段集体行动的主要特点, 便是以经济正义和生存性为主导。这三个阶段前后连贯来看, 就呈现出集体行动目标日益世俗化的趋势。

其次, 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基层化(localization)”的趋势, 也即集体行动所针对的抗议目标, 其所处的地理行政层级, 越来越走向基层的政治空间。这一趋势同样昭示着, 全国性集体行动的浪潮, 已经不再是当代中国最为典型的集体行动场景, 取而代之的是散发的、有限地理空间内的有限目标的集体行动。与此同时, 伴随着基层化的趋势, 基层政府及其代理人日益卷入到地方性的集体行动场景之中, 使得当代中国的集体行动, 更接近于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家新近提出的“对抗性政治”这一理想型(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 也请参见刘能, 2008, 注释1)。

第三, 一个更为显著的趋势, 便是集体行动参与者对破坏性战术的青睐。换言之, 在过去三十年间, 随着集体行动目标的世俗化和集体行动爆发空间的基层化, 集体行动更多地表现出暴力化的倾向(violence-oriented), 尤其表现为对生命和财产的集体性侵犯。关于破坏性战术的选择, 大概有两种可能性: (1)暴力的使用, 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 也即考虑到了这一手段的实施, 对集体行动目标和结果之达成的有效性; (2)暴力的使用, 更多的是一种原发性的选择, 也就是说, 使用暴力是天然的选择, 是一种信仰。如何衡量当代中国社会集体行动中的暴力使用呢? 它究竟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 还是原发性的选择, 还是两者的混合呢? 要想做出正确的判断, 方法之一是在

经验研究中采集数据来加以验证,另一种方法则是返回到“历史—文化的”集合体中,去寻找可能的证据。而这,正是下一节的主要任务之一。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社会集体行动的主要特征,可以做如下的界定:(1)从集体行动的目标来看,它更有可能的是物质利益取向的,而非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2)从集体行动的形式化要素来看,它更有可能是自发的、短暂的且局限在有限地理空间之内的,而不是高度组织化的、全国性的和持久的公民行动;(3)从集体行动的抗议对象来看,

基层地方政府及其代理人日益成为集体行动的当事人,而不仅仅是仲裁者和社会控制者;(4)从集体行动的战术选择来看,它更有可能使用破坏性的战术,突出地表现为针对人身和财产的暴力行为。

## 2. 三大趋势和两个“历史—文化的”影响来源的关系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之所以扩展我们的时间框架,事实上是想深究,过去三十年间中国集体行动场域所表现出来的三大趋势,除了转型社会的结构变迁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其历史—文化的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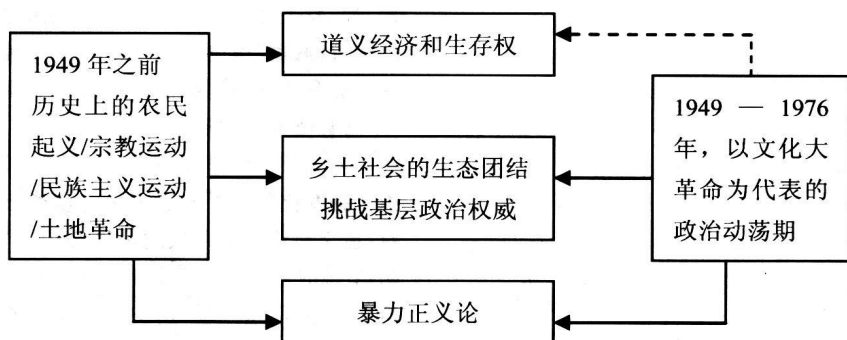


图2 三大趋势和两大“历史—文化的”影响来源之间的空间关系

图2给出了1949年之前的集体行动史和1949—1976年间的集体行动史,与过去三十年间集体行动场域的三大趋势之间的影响关系的一个空间描摹。对应着世俗化的趋势,我们找到的历史文化根源,是道义经济和生存权的伦理心智;对应着基层化的趋势,我们找到的历史文化根源,是乡土社会的生态团结和挑战基层政治权威的过去经验;对应着暴力化的趋势,我们找到的历史文化根源,则是我所称的暴力正义论的政治文化心理。

### (1) 道义经济和生存权的伦理心智

道义经济和生存权这一伦理心智,是中国文化中最朴素的民本主义、民生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的外化形式之一,它承认生存和物质利益的伦理正当性。在头一个“历史—文化”时期,我们看到了这一伦理心智的盛行:从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到近代时期的饥民抢食暴动,一直到土地革命时期的行动动员,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类伦理话语的出场。在后一个“历史—文化”时期,道义经济和生存权的伦理心智,由于受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制,似乎隐匿不见了,只在最极端的时期(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才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复苏。这也是为什么图2右侧的箭头为虚线的缘故。

### (2) 乡土社会的生态团结和挑战基层政治权威的过去

经验

乡土社会的生态团结,指的是由居住空间聚落所支撑的社会连带,具有天然的整体动员(bloc recruitment)的优势。在基层共同体社区,居住空间聚落不仅体现了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的叠加,而且也预示了成员间共同的空间权益和类似的产权格局。而挑战基层政治权威的过去经验,是构成基层社会“官—民”二元对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头一个“历史—文化”时期,整个集体行动中充斥着挑战基层政治权威的历史信息——从帝国时代的底层起义和官民对抗、到民国时期的地方割据和国民革命时期的土地运动等。在后一个“历史—文化”时期,历次社会政治风波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均可以看到对基层政权的冲击(如工宣队进驻、军管和革委会的成立等)以及对基层政权代理人的人身攻击(批斗、抄家等)。因此,在图2中,我们认为这两个时期通过“乡土社会的生态团结”和“挑战基层政治权威的过去经验”这两个具体机制,影响到了过去三十年间的基层化趋势。

### (3) 暴力正义论的政治文化心理

暴力正义论这一政治文化心理,指的是这样一种认知,即暴力的实施,是彰显正义的象征途径和外显手段,暴力实施者因此而获得了正义,而暴力的实施对象,则蒙

受了一个符号标定，也即接受暴力处罚，是对其非正义的一种仪式化标定。在头一个“历史—文化”时期，我们大量地看到了法律实践中的这种暴力倾向，如各种针对身体的酷刑（以宫刑和凌迟为代表）；而构成传统侠客文化的支柱之一，也是这一政治文化心理。在后一个“历史—文化”时期，我们也常常在批斗、揪斗、游街等冲突性场景中看到仪式化的公开暴力。换言之，接续前一节的疑问，即破坏性战术的使用，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策略性的考虑，又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原发性的选择，作者更加倾向于后一种判断，也即在中国的集体行动场景中，暴力的使用，更多扮演着标定和彰显正义的功能。

综上所述，在我们扩展了审视中国当代集体行动的时间框架之后，我们发现了两个“历史—文化”时期与当代中国集体行动场域的历史关联：通过“道义经济和生存权的伦理心智”、“乡土社会的生态团结/挑战基层政治权威的过去经验”和“暴力正义论的政治文化心理”这三重历史文化根源，我们也许能够解释在当代中国集体行动场域中观察到的三个趋势：世俗化、基层化和暴力化。

### 3. 未来的路径选择：四个可能的图景

在图1中，我们提出了关于未来路径选择的四个可能图景：我们究竟更有可能走向一个典型的公民社会呢，还是更有可能走向一个人道主义的道德国家？抑或我们有可能后退到一个监控社会之中，还是说我们更有可能找到一个更为现实的平衡状态，一个技术治理社会呢？我们首先对这四个可能图景所代表的含义，做简要的说明，同时指出其在未来实现的可欲性和可能性。

#### (1) 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sup>⑤</sup>所指向的集体行动图景，指的是社会变迁需要的表述和实施，不但可以依循制度化的途径，而且不排除任何一个公民的参与。它遵循的是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目前成熟的公民社会，也主要见于西方发达社会之中。由于这一图景并没有对图2所示的三重“历史—文化根源”做出回应，因此，这一图景未来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较低。

#### (2) 监控社会

在另一个极端，监控社会意味着任何形式的集体行动都是不受欢迎的，因此，政体将采用极端的社会控制手段，使得集体行动的出场被遏止在摇篮里。它的弊端显而易见：合法暴力的过度使用，将造成社会福利的普遍衰减和社会效用的极大降低。虽然监控社会对“乡土社会中的生态团结/挑战基层政治权威的过去经验”和“暴力正义论的政治文化心理”这两重“历史—文化根源”做出了

回应，但由于其所导致的社会后果是高度负面的，因此我们认为它实现的可能性也较低。

#### (3) 人道主义道德国家

人道主义道德国家，是“威权主义+父权制+儒家道德”的综合体，它预示了一个全能的、道德的和正义的克里斯玛型政治领导核心的存在。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其深厚的基础，但却面临着当代治理复杂性的挑战，也即理性和效率的挑战。由于它在意识形态上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因此，这一图景在未来实现的可能性也还是有的，因为这一图景不仅回应了“道义经济和生存权的伦理心智”和“乡土社会中的生态团结/挑战基层政治权威的过去经验”这两重“历史—文化根源”，而且其治理目标本身就在于提升社会福利和社会效用。

#### (4) 技术治理社会

与人道主义道德国家相比，技术治理社会是“治理知识+制度化渠道+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综合体，它不但对“道义经济和生存权的伦理心智”、“乡土社会中的生态团结/挑战基层政治权威的过去经验”和“暴力正义论的政治文化心理”这三重“历史—文化根源”全部做出了回应，而且避免了人道主义道德国家在治理实践上的缺陷。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

⑤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社会转型具有高度的多面性和复杂性。首先，从其规模和广度来看，至少涉及到了如下几个重大社会变迁——以GDP和国民收入持续稳定高速增长为表征的工业化；以国土地貌急剧变化和住宅私有化进程为表征的城市化；以高新技术和数码产品采纳为表征的技术进步和扩散；以中国制造品的全球消费和资本跨国流动为表征的全球化；以劳动力的城乡间迁移和跨国迁徙为代表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以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高等教育扩张和一个新型专业阶级的诞生为代表的教育扩张和专业化；以国有资产流转和资本市场的发育为代表的产权多元化；最后，以享乐主义价值观和大众消费的盛行为代表的生活方式转型。其次，从社会转型的速度来看，光是指出中国人口代际更替的速度和职业类别的扩张速度，就可窥其一斑。此外，就本文的主题而言，中国社会转型的另外两个维度也需要得到考察：一个是其合法性维度，另一个则是其国际性维度。前者涉及到了一个“经济成长的物化过程”（the reification of economic growth），后者则涉及到了国际“知识—意识形态的移植和入侵过程”（the invasion of international knowledge-ideology system）。这两个社会转型维度与本文论述主旨的关系在于——“经济成长的物化”这一概念，实际上指明了中国社会中各类社会行动者对经济成就和经济福利的无限制追求，并以此作为第一评价标准的事实，而这一点，在目前看来，似乎已经深刻地

架构了卷入集体行动各方的认知框架；而“国际知识—意识形态的移植和入侵”，则指向了后发国家所面临的“政治正确”压力，对卷入集体行动的各方行动者和社会控制机构的战术选择范围，施加了相当可观的限制。

- ②关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集体行动浪潮，出于规避政治风险的缘故，在国内学术界并未产生大量的作品。主要的研究，是由国外学者和在国外求学的中国裔学者作出的（Walker and Gong 1993；Wasserstrom and Peery, 1994；Zhao 2001）。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后两次集体行动浪潮的关注上。这一阶段的利益重构和利益博弈，既涉及到经济性的议题（李利群、周克付，2005），又涉及到政治性的议题（陈映芳，2006）；或者同时涉及到了两者（刘玉照，2004）。就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来看，这一阶段的国内研究大多是经验性的和个案性的探究：如针对都市地区的街区居民集体行动（石发勇，2005；何艳玲，2005）、业主维权运动（孟伟，2006；张磊，2005）、工人集体行动（游正林，2006；佟新，2006；陶宇，2008；胡美燕，2008）和农民工集体行动（林磊，2007；周斌，2007；杨正喜，2007）；针对乡村地区的农民抵抗（应星，2001；2007；李一平，2005；肖唐镖，2005；于建嵘，2007a；2007b；王勇，2007；刘能，2007），和作为一种常规战术的集体上访（郑卫东，2004；薛艳，2007；李春锋，2008）。大量的此类研究，都采取了定性研究的取向。唯一的几个例外，是刘爱玉等（2005）和冯仕政（2006；2007）。前者利用厦门市的调查资料，剖析了影响下岗失业工人做出对抗性行动选择的多重因素，后者则借助于中国GSS调查数据，考察了当代中国单位组织内的集体抗争潜力。
- ③更早一些时候，作者也曾经对有可能在中国都市地区爆发的社会运动/集体行动，做过一个类型学的处理：未来中国都市地区的主流集体行动类型，分别是精英主导的社会运动、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少数群体发起的社会运动、宗教教派运动和都市政治恐怖主义（刘能，2004：64—65）。在权衡了怨恨生产、领导层供给、社区动员网络的深度和广度、政治机遇水平和成功预期这五个变量维度之后，文章预测，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和由少数群体发起的集体行动，在未来的都市情境下，具有较高的爆发可能性。现在来看，一般性公民社会运动并未能够在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中获得必要的组织支持；对它们的支持，往往表现为态度和观念上的支持，表现为由大众媒体中介了的社会变迁需求的密集表述，而很难演化为持续的、跨地域的全国性专业化社会运动。而由特定少数群体发起的集体行动，其爆发态势则得到了初步的验证：从2008年的几个重要案例——云南孟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和多个城市出租车司机的罢运事件——来看，有限地理空间内的利益博弈，将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中集体行动努力的常态。
- ④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08年11月18日日本人在搜狐新闻中心（Sohu.com）上阅读到的一个地域共同体的集体行动案例：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部分拆迁群众集体到市政府上访并最终

酿成暴力性冲突的结局。

- ⑤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长期以来就是以公民社会为本本的。只有政治进程模型的出现，才改变了理论上的这种不平衡，并引导研究者去关注少数群体和本土社区的政治和文化抵抗（Mansbridge and Morris 2001；Morris 1985）。

## 参考文献

1. 陈映芳：《行动力与制度限制：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级》，《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2. 冯仕政：《单位分割与集体抗争》，《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大力支持，积极参与”：组织内部集体抗争中的高风险人群》，《学海》2007年第5期。
3. 何艳玲：《后单位制时期街区集体抗争的产生及其逻辑——对一次街区集体抗争事件的实证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05年第3期。
4. 胡美燕：《弱者的反抗：围绕L厂一次女工集体行动的原因分析》，华东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8年。
5. 李春锋：《农民的利益表达与集体行动：对豫东S村一起上访事件的解读》，华中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8年。
6. 李利群、周克付：《D村定销户事件：寻租经济学分析——基于制度主义、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4期。
7. 李一平：《城郊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缘起、方式与机理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
8. 林磊：《权益受损与抗争行为：农民工的维权行动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年。
9. 刘爱玉、王培杰：《下岗、失业工人的行动选择分析——以厦门市调查为例》，《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4期。
10. 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理论分析》，《开放时代》2004年第4期；《中国乡村社区集体行动的一个理论模型：以抗交村提留款的集体行动为例》，《学海》2007年第5期；《当代中国群体性集体行动的几点理论思考——建立在经验案例之上的观察》，《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11. 刘玉照：《集体行动中的结构分化与组织化——以白洋淀某村修路与基层选举为例》，《社会》2004年第11期。
12. 孟伟：《日常生活的政治逻辑：以1998—2005年间城市业主维权行动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13. 石发勇：《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学海》2005年第3期。
14. 陶宇：《权力—利益秩序的实践逻辑：以H厂为个案的一次集体行动“过程—事件”考察》，吉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8年。
15. 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16. 王勇：《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以川北某开发

- 区失地农民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07年。
17. 肖唐镖：《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状况——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18. 薛艳：《失地农民集体上访的动员方式：以L村为研究个案》，吉林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毕业论文，2007年。
19. 杨正喜：《珠三角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冲突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07年。
20.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三联书店，2001年；《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21. 游正林：《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对一起集体上访、静坐事件的个案研究》，《学海》2006年第2期。
22. 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年；《利益表达、法定秩序与社会习惯——对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行为取向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6期。
23. 张磊：《业主维权运动：产生原因及动员机制——对北京市几个小区个案的考察》，《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4. 郑卫东：《农民集体上访的发生机理：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2期。
25. 周斌：《农民工维权行动的初步分析》，中共中央党校硕士毕业论文，2007年。
26. Andreas Joel. 2002. "Battling ove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wer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31 (4): 463-519.
27. Chow, Tse-tung. 1960.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8. Esherick, Joseph. 1987.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9. Mansbridge, Jane J., and A Hon Morris. 2001. *Opposi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Subjective Roots of Social Prote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0. McAdam, Doug,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2001.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1. Morris Aldon. 1984. *The Origins of Civil Rights Movement: Black Communities Organizing for Change*. Free Press.
32. Perry, Elizabeth J. 1985. "Rural Violence in Social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03: 414-440; 1993.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3. Perry, Elizabeth J., and Mark Seldon. 2003.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34. Scott, James.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35. Tilly, Charles. 1986. *The Contentious French: Four Centuries of Popular Strugg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6. Tilly, Charles, Louise Tilly, and Richard Tilly. 1975. *The Rebelious Century, 1830-193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7. Wakler, Andrew G. 2002. "Beijing Red Guard Factionalism: Social Interpretations Reconsidere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 (2): 437-471.
38. Walder, Andrew G., and Gong Xiaoxia. 1993. "Workers in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Politics of the Beijing Worker's Autonomous Federa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9: 1-29.
39. Wasserstrom, Jeffrey N., and Elizabeth J. Perry. 1994.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2nd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40. Zhao Dingxin. 2001.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作者简介：刘能，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毕素华〕